

院藏清乾隆

〈掐絲琺瑯動物紋豆〉的製作脈絡

胡蘆文

院藏清乾隆〈掐絲琺瑯動物紋豆〉為現知僅存以動物紋為飾的傳世掐絲琺瑯豆，該器乃清宮依據《西清古鑑》「周百獸豆」重新畫樣所製。其上動物紋飾姿態生動，饒富趣味，為本院重要的掐絲琺瑯收藏之一。本文將探討該器的製作脈絡，及其稿樣繪製過程所隱含之乾隆時期仿古概念的內在意義。



式樣探源

傳世掐絲琺瑯作品中罕見以具象動物紋作裝飾之例，是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掐絲琺瑯動物紋豆〉的設計便更顯匠心獨妙。此器銅胎鍍金，器底楷書陽文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款。全器以松石藍琺瑯為地，滿佈格式化卷草紋鍍金掐絲；器身界隔數層，每層佈排顏色多樣的動物紋，姿態生動活潑，若百獸悠遊草場；蓋上捉手內壁飾龍紋雙層，蓋頂中央捉手內

置一簡化團龍。（右圖）據考古發現，陶豆出現於新石器時代；銅豆始見於殷商，通行於兩周，春秋晚期至戰國盛行。《周禮·天官·醢人》記載，豆乃作盛肉醬、肉汁、醬菜等之用；另外，經學界考證甲

骨文以及目前考古證據顯示，上古時期的豆亦曾用以盛裝黍稷之類。(註一)〈招絲珫瑯動物紋豆〉於清宮的使用脈絡已難重建，然其成做過程卻仍有文字可循，以下將聚焦探究該器的製作始末，釐清其中所承載之歷史意義。

〈招絲珫瑯動物紋豆〉(圖一)的裝飾紋樣與《西清古鑑》卷二十九所載之「周



圖2 《西清古鑑》卷29 周百獸豆 清乾隆20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百獸豆」(圖二)十分相近，該器應是據此圖譜所錄銅豆而製。(註二)《西清古鑑》記錄「周百獸豆」的尺寸與重量為：「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三寸，口徑五寸三分，足徑三寸四分。重六十三兩。」若以今日常用的度量單位換算，即為全器連蓋高約二十一·四公分，深約九·六公分，口徑約十六·九公分，足徑約十·九公分，重

約二·三五公斤。(註三)此外，北京故宮博物院一件清宮舊藏春秋晚期〈嵌紅銅狩獵紋豆〉(圖三)的動物紋飾與《西清古鑑》「周百獸豆」形貌雖略有出入，然大部分仍



圖4 春秋晚期 鑲嵌狩獵畫像豆 上海博物館藏 引自陳佩芬，《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上海博物館，1995，頁86。



圖3 春秋晚期 嵌紅銅狩獵紋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103。



圖1 清 乾隆 招絲珫瑯動物紋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1 〈嵌紅銅狩獵紋豆〉



圖6-2 《西清古鑑》「周百獸豆」



圖6-3 清乾隆〈掐絲琺瑯動物紋豆〉

〈嵌紅銅狩獵紋豆〉、《西清古鑑》「周百獸豆」、清乾隆〈掐絲琺瑯動物紋豆〉局部比對

二、清乾隆〈掐絲琺瑯動物紋豆〉的畫樣來源

如前所述，〈掐絲琺瑯動物紋豆〉之

的畫師嘗為表現特殊角度的造型或花紋而改採不同視點呈現器物，亦有調整觀看視角以利紋樣描寫更為全面者。(註六)如此看來，「周百獸豆」採多視點的方式呈現作品細節使其來有自，《西清古鑑》描繪該器的調整原則或可據韋氏觀察之補充。

紋飾與〈嵌紅銅狩獵紋豆〉、《西清古鑑》「周百獸豆」雖能對應，但整體設計乍看之下仍與二者有一定差距。根據《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稱「活計檔」)，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九月二十六日，琺瑯作有製作「掐絲琺瑯百獸豆」的紀錄，其文如下：

副催長同泰交來旨意帖一件，內開二十四日太監常寧交百獸豆畫紙樣一張，

傳旨：「着照畫樣做掐絲琺瑯百獸豆一件，欽此。」
於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將做得掐絲琺瑯豆一件安在奉三無私(註七)，呈進交乾清宮訖。

這當是〈掐絲琺瑯動物紋豆〉的製作始末。之所以挑選「周百獸豆」製成掐絲琺瑯，或許與其較《西清古鑑》其他同類器物在紋樣表現上更豐富多變有關。活計檔所述

可相互對應。據北京故宮博物院圖錄所述，該器通高二十一·四公分、口徑十八·五公分(註四)，很可能便是《西清古鑑》「周百獸豆」摹繪原器。相似的器物也見於考古發現，如上海博物館藏一九二三年陝西渾源李峪村出土之春秋晚期〈鑲嵌狩獵畫像豆〉(圖四)即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嵌紅銅狩獵紋豆〉在器形、紋飾與大小上皆頗近似。(註五)



圖5 《西清古鑑》卷29 周百獸豆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嵌紅銅狩獵紋豆〉及《西清古鑑》「周百獸豆」的差異

〈嵌紅銅狩獵紋豆〉雖可對應為《西清古鑑》之「周百獸豆」，但在由實物轉繪為平面圖像時，卻又產生明顯差異。〈嵌紅銅狩獵紋豆〉器身中央動物紋體型大小懸殊，而《西清古鑑》摹繪此器時將動物體型差距縮減，以避免數體型較大之動物佔據大部分空間之虞，使之能在有限的平面空間內置入大量的動物。該書且採正面平視的多視點角度記錄各別動物紋樣，以完整呈現姿態細節。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則是《西清古鑑》在描繪「周百獸豆」時紋樣細節上的安排。〈嵌紅銅狩獵紋豆〉所繪主題為「狩獵」，這點從其上諸多持武器的人物紋表現可以推知，該器器身中央的持矛人物即為一例。(圖六一)然而，「周百獸豆」同一位置的人物則被改繪作一手插腰、一手上揚貌。(圖六一二)同樣將人物所持武器弭除的改動亦見於器蓋諸多持矛或張弓的人物紋表現——《西清古鑑》「周百獸豆」蓋上有六個人形紋樣，皆可對應〈嵌紅銅狩獵紋豆〉蓋上人物。這些紋飾原本大都持有武器，但在「周百

獸豆」蓋上卻有部份人物的武器消失了。(圖五)這也是該件作品由「狩獵紋豆」轉變成「百獸豆」的關鍵因素，狩獵的劍拔弩張在此調整之下幻化為百獸舞動的昇平氛圍，圖譜於是呈現了迥異於原器旨趣的紋飾意涵。

吾人須從宋代以降古銅器圖譜製作的脈絡切入考量，方能正確理解《西清古鑑》「周百獸豆」圖像摹繪上與原器所產生的落差。《西清古鑑》為梁詩正(一六九七—一七六三)於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奉敕纂修的青銅器圖譜。據《西清古鑑》前列辦理諸臣職名，該書繪者有梁觀、李慧林、丁觀鶴、党應時、羅福收、陳士俊及程梁等七人。經學者考證，羅福收「工山水、人物、樓觀，採用西洋法，筆意極細」，顯示這批畫師中應不乏具備掌握西方描寫空間、體量等技法者，然該書圖像繪製卻未以寫實為標的。從乾隆於《西清古鑑》〈上諭〉「仿《博古圖》遺式」的要求到書中圖像的呈現，皆顯示《西清古鑑》乃以宋徽宗(一〇八二—一一三五，一一〇〇—一一二六在位)敕編之《宣和博古圖》圖繪傳統作為記錄清宮收藏的原則。韋心澄在其研究中即已指出，《西清古鑑》



圖7 清乾隆〈招絲琺瑯動物紋豆〉正、反側雷同紋飾

古鑑》「周百獸豆」完全一致，重量則多約三百公克，可見清宮製作〈招絲琺瑯動物紋豆〉時確實刻意模仿「周百獸豆」的形制。然此器的紋樣設計卻又與「周百獸豆」有明顯的不同。首先，〈招絲琺瑯動物紋豆〉改變了《西清古鑑》「周百獸豆」錯落的佈排形式，將動物以約略等寬的間隔平行地面分層佈排於器表。此一構圖使該器整體的視覺效果不若「周百獸豆」或其描繪對象〈嵌紅銅狩獵紋豆〉生動，反因比例統一、物象整齊羅列而更顯格式化之感。我們或可將〈招絲琺瑯動物紋豆〉理解為清宮藝匠調整原圖譜百獸位置後的結果。此外，該器出現多處將原於「周百獸豆」為人物的紋飾製成動物紋的狀況，證明其雖亦步亦趨地複製原圖譜所記載的器物尺寸，但再現原器的裝飾紋樣並非此次製作的目標。另一方面，此器正、反面分別出現形貌、顏色近似的動物紋以同樣的相對位置構成（圖七），顯示工匠在繪製立體作品的畫稿樣時，很可能因受限於平面圖譜而產生紋飾重複的現象。

總結而論，《西清古鑑》在記錄〈嵌紅銅狩獵紋豆〉時有意無意地將「狩獵」意象降低，此一改動亦見於從「周百獸豆」

之「畫紙樣」已難再現；不過，分別將清乾隆〈招絲琺瑯動物紋豆〉與〈嵌紅銅狩獵紋豆〉及《西清古鑑》所繪「周百獸豆」的紋飾細節進行比對，仍能從中推敲活計檔中畫紙樣之圖像的可能來源。

前述〈嵌紅銅狩獵紋豆〉器身中央持矛人物右上側為一垂手立獸，頭上有角。（圖六一一）「周百獸豆」將此持矛人物與立獸繪作對舞貌，右側垂手立獸改作雙手插腰之姿，頭上二角貌若尖耳。（圖六一二）這組圖像同樣出現於〈招絲琺瑯動物紋豆〉器身下方，此處二者皆具短尾，顯見其為「獸」，而非「人」。此組圖像右側之獸雙手明顯做插腰態，頭上有尖耳二，與「周百獸豆」形像相仿。（圖六一三）此外，在〈嵌紅銅狩獵紋豆〉同組圖像的左側有一牛，頭上二角清晰可見，狀似低頭抵牻。然《西清古鑑》「周百獸豆」卻將之改為一獸昂首蹲立。而〈招絲琺瑯動物紋豆〉兩立獸旁之動物恰酷似「周百獸豆」該昂首小獸。（圖六一四）由以上比對可知，〈招絲琺瑯動物紋豆〉的紋飾無論是形貌或姿態都與《西清古鑑》所繪「周百獸豆」更為相近。換言之，該器的製作當與《西清古鑑》關係密切。吾人可依現存作品推測活計檔中用以製作「招

絲琺瑯百獸豆」的畫樣乃參照《西清古鑑》「周百獸豆」之平面圖繪而來，並非〈嵌紅銅狩獵紋豆〉實物。

轉譯舊藏

自按〈嵌紅銅狩獵紋豆〉繪製《西清古鑑》「周百獸豆」，至據「周百獸豆」畫樣成做〈招絲琺瑯動物紋豆〉，此過程乃清乾隆朝轉譯舊藏的一個清楚案例。據學者張臨生研究，至晚於北宋政和年間（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即有仿照古器物圖譜製作新器之例，靖康難後，又有依《三禮圖》、《宣和重修博古圖》再鑄祭器者。明代因應市場需求，仿古偽製猖獗，無古器翻製者常以《宣和重修博古圖》為本。（註八）依古器物圖譜做器為宋代以來仿古的普遍作法。乾隆既有意追仿宋徽宗《宣和博古圖》作《西清古鑑》，著造辦處依《西清古鑑》畫樣製作〈招絲琺瑯動物紋豆〉便不足為奇。

依現代度量標準，清乾隆〈招絲琺瑯動物紋豆〉通高二十一·四公分，口徑十六·九公分，器深九·六公分，足徑十·九公分，重約二·六公斤。尺寸與《西清

到〈招絲琺瑯動物紋豆〉的轉化過程。該器又透過分層的構圖及於器地滿佈卷草紋的做法，使其裝飾風格更趨格式化。乾隆時期對造辦處製器之稿、樣皆有一定程度的控管，是器成做之畫紙樣必經呈覽，方纔准作。〈招絲琺瑯動物紋豆〉的紋飾不完全參照《西清古鑑》「周百獸豆」，當與乾隆皇帝的要求有關。

通過本文的討論可知，不同於〈嵌紅銅狩獵紋豆〉承載之軍事鍛鍊的圖像意涵，經過《西清古鑑》「周百獸豆」及清宮匠

人畫紙樣的轉譯，〈招絲琺瑯動物紋豆〉以當代審美觀念呈現出乾隆皇帝締造之繁華盛世下的昇平景緻。而該器成做的過程，則是以古器物圖譜為本，進行當代文化創造的又一成功案例。

本文之完成受益本院器物處吳曉筠科長的寶貴意見，及張佐助理研究員之協助，在此併申謝忱。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頁一四七。
2. 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三，頁一九八。
3. 本文度量單位藉國立臺灣大學資工數位典藏與自動推論實驗室「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計算，該系統網址為 <http://hdl.ntu.edu.tw/weight-measure/transformation8.php>。
4.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館》，北京：故宮出版社，二〇一三，頁一〇二；杜迺松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銅禮樂器》，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六，頁九〇，該書此器圖像左右倒置。
5. 關於上海博物館〈鑲嵌狩獵畫像豆〉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嵌紅銅狩獵紋豆〉的關係，以及同時期類似作品之紋飾比對、定年依據與裝飾圖像來源，詳參許雅惠，《東周的圖像紋飾與刻紋銅器》，《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卷第二期，二〇一三，頁六四—六六。
6. 《西清古鑑》成書之時代脈絡、學術水平等狀況，詳見章心澄，〈「西清四鑑」相關問題探析——兼論乾隆皇帝的青銅器藝術收藏〉，收入《兩岸故宮第四屆學術研討會——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論文集（下）》，二〇一三，頁七二—七五八；及〈揭開歷史帷幕的一角——探尋《西清續鑑》繪圖者的身影〉，《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八五期，二〇一五，頁五八—六三。《宣和博古圖》之相關討論見許雅惠，〈《宣和博古圖》與《古圖錄》的版印特點與流傳——從中研院史語所藏品談起〉，《古今論衡》第十八期，二〇〇八，頁七六—九六。
7. 奉三無私殿為清宮辦理宗親宴之處，位於圓明園殿後。據清乾隆〈招絲琺瑯動物紋豆〉文物典藏號可知該器清未置於端凝殿左右屋，或經移動，已難追溯。
8. 張臨生，〈文王方鼎與仲駒父簋〉，《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五卷第一期，一九九七，頁一—四四。